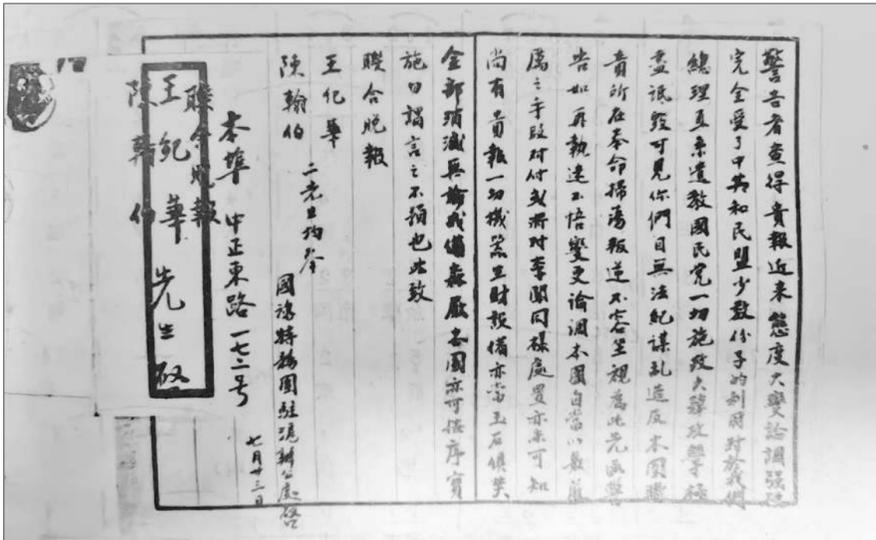


# 王纪华：卷起亚细亚的星云

赵宾

“联合起来，朋友们，联合起来，保卫我们的大旗。集中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是人民的喉舌，要发出雷霆的主张，争取民主自由……”郭沫若作词《联合晚报》的社歌以进军的速度突破天罗地网，向法西斯余孽帝国主义作毫不容情的声讨。而作为报社的领导者，王纪华带领大家不畏敌伪强暴，团结斗争。



国民党特务给《联合晚报》王纪华、陈翰伯的恐吓信。

## 占领上海报刊宣传阵地

王纪华1910年出生于上海，1936年1月由胡乔木、王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；1938年春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；同年2月参加发起上海职业界救国会，任理事；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；同年12月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，当选理事；1948年5月后，往返港沪，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，转达民建响应“五一口号”的意见；1949年春传达毛泽东邀请黄炎培赴港北上同商国是的指示；同年2月协助筹建民建港九分会；3月由港赴京，随军南下，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纪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、市税务局副局长、市财经委员会秘书长、民建中央常委、秘书处处长、文化部老干委委员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顾问、世界经济导报社副理事长等职。

王纪华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社会活动家，活跃在新闻出版战线上的媒体人。1932年他喜读邹韬奋《生活周刊》，认识了黄炎培、杨卫玉等中华职业教育社老师，在上海海关俱乐部协助编辑《关声》月刊。1934年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远军反帝同盟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“进社”，参加创办《小职员》半月刊等刊物。1938年任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训导主任、校长兼中华业余图书馆馆长，根据中共的指示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举办“现代知识讲座”，为抗日救亡培养大批人才。同年，担任中共领导的《每日译报》社常务董事，兼任《译报周刊》经理和编辑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广泛团结社会各界爱国人士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投降。上海为国民党收复后的统治区，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尚未复刊。嗣后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刘尊祺由重庆抵海，共同策划，借《新闻报》为办报

场所，《联合日报》一马当先，于9月21日出版，占领了上海报刊宣传阵地。刘尊祺任社长，王纪华任经理，编辑部人员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。

可不久，国共重庆谈判的“双十协定”成为一纸空谈，美国新闻处停止以该处名义出版《联合日报》，国民党当局以需重新登记为借口，《联合日报》被迫于同年11月30日宣告停刊。

## “把千百万颗子弹打在一个标上”

《联合日报》被迫停刊后，王纪华重整旗鼓，决定创办《联合晚报》，为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，得到黄炎培大力相助。黄炎培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有关要员打招呼、写条子、疏通关系。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认为黄炎培为民建会有自己的一张报纸，替中小工商业者说说话，遂予批准。

报社由金仲华、刘尊祺、王纪华等7人组成社务委员会，王纪华任发行人兼总经理。罗致、姚溱、冯亦代等11人为编辑，黄冰、翁郁文、姚芳藻等11人为记者。联合晚报社租赁原华美晚报社设备开张，印刷的机器房、排字房修整翻新工作，先后由工务科主任钱杰、张达平、毛人为等负责。《联合晚报》即于1946年4月15日正式公开出版发行。

中共《新华日报》在上海筹备就绪，一再申办登记。但国民政府为控制舆论，不批准出版。周恩来遂以《联合晚报》作为代替，要求严格保持民营姿态，不许有党报作风，并将报社划归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。王纪华的组织关系随即转到中共驻沪办事处。《联合晚报》代替《新华日报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

喉舌。

周恩来嘱王纪华：“要运用《联合晚报》的有利条件，讲出人民要讲的话，报道人民要知道的事，必须反映社会真实，表达要求民主、和平、反对独裁、反对内战是万众一心的愿望，团结人民，打击敌人，把千百万颗子弹打在一个标上。”

王纪华带领《联合晚报》紧紧把握这一办报方针，进行报道，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真相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，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、反独裁、反饥饿、反迫害运动的实况，影响越来越大。

《联合晚报》办得红红火火，可是报社筹集的资金仅几千元，要支撑每天出版一张的大型报、职工百余人的局面，非常艰难。纸张无隔宿之粮，有时纸型上机架，卷筒纸还没运到，稿费、工资不能按时发付，经济上的严重困难，常使王纪华焦头烂额。他费尽心机调头寸、拉广告，扩大订户，开源节流，以满足资金需求，优化资金配置，渡过重重难关。

## “要为民建会工商界讲讲话，要为民众讲讲话”

1946年6月23日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“下关惨案”后，王纪华与黄炎培一道代表民建会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代表。6月26日经王纪华统筹安排，《联合晚报》在头版刊出了5幅受伤代表卧床不起的大照片，旁边配的大字标题是：“请看！这些荣誉的受伤者！他们的血是会白流的吗？不！不！绝不会的！”使得歪曲事实真相的国民党官方报纸陷于极端被动的窘境。1947年2月9日发生劝工大楼血案，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特务活活打死的事件，《联合晚报》发表社评：“苦难的全国人民啊！请看这

还像什么世界！”

这两次真实的报道，王纪华都受到当面严重警告，也引起国民党南京当局的密切关注，召王纪华到南京总统府训话。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板起面孔，拍案指责：“《联合晚报》胆敢与政府唱反调，报社编辑部里定有共产党。你王纪华为什么放弃赚钱的工厂不办，而办赔本钱的《联合晚报》，不是别有意图吗？”

当时外界都知道王纪华是地地道道的职党派、民建会理事、大资本家王宽诚的兄弟。王纪华即推托说：“老师黄炎培要我办报，要为民建会工商界讲讲话，要为民众讲讲话，师命难违，不得不办！”

吴铁城见事出有因，无可辩驳。于是提出两项条件为诱饵：一是拨付一笔钱，《联合晚报》停办；二是由政府出钱办下去，为政府说说话。要王纪华好好考虑，抉择前路。

国民党软硬兼施，还由特务写恐吓信给王纪华和总编辑陈翰伯，扬言“《联合晚报》如不改变论调，将以李公朴、闻一多同样处置（指遭暗杀）”。

这些威胁利诱的手段，王纪华至死不从。于是，一批国民党特务冲进报社二楼办公室、编辑室捣乱打砸，进行破坏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《联合晚报》颠覆政府的罪名，于1947年5月24日遭武装勒令查封，记者黄冰、杨学纯、姚芳藻3人被捕。

逢此重大变故，王纪华镇定自若，一面广告读者，一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，并设法营救被捕记者，安排编辑人员安全撤退。组织王燮林、顾顺彤、程豪等13位经理部工作人员，坚持岗位，做好清理债权和债务，发还订户订费等工作，在敌特监视的环境下，奋战三个月，完成了报社善后工作。

（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）

天然山水，以子之姓与有一日相知之分。”在这里，还养育有梅花鹿。早在1917年，张謇就赠诗梅兰芳：“老夫青眼横天壤，可忆佳人只姓梅。”

1924年1月，张謇在上海忙于接连参加淞沪港务会议，与驹井德三晤谈，参加大生一厂、二厂、三厂董事会联合会议、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行务会议等，然而，还是忙里偷闲，专门去观看了梅兰芳演出，对梅兰芳日益成熟的艺术大加赞赏。当然，张謇也对表演的不足之处直抒胸臆，不仅是唱腔，而且细化到梅兰芳所饰演角色的语言、道具、造型和舞台设计等各个方面。

“我不能北，子亦未必南也。”张謇惜梅，恨又不能见。1925年6月18日，已古稀之年的张謇致函“浣华贤弟”梅兰芳，是《张謇全集》中最后一通信札。一开头就言，“久别殊念，世乱未已”，仍重珍重”。此前，听说梅兰芳要出访美国，张謇还为之拟订行程，详细列出准备事项，不得不让人叹服无微不至。

上一代人的遗憾，一直到更后剧场重建开业后才有所释然机缘。2002年10月15日，主持梅欧阁纪念馆开馆暨“大节风采、艺坛丰碑”展览揭幕活动时，笔者见梅兰芳之子梅葆玖、梅绍武兄弟俩，欧阳予倩养子欧阳山尊，以及张謇孙女张柔武、孙子张绪武姐弟俩，几人紧紧相拥，众人也都热泪盈眶；张梅忘年之交的情缘，历经一个世纪，几代人的交情仍在默默地延续……

（本文作者系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特聘教授，张謇企业家学院特聘研究员，曾任中共江苏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。）

# 胡适与“胡适博士著”

刘诚龙

蔡元培夸胡适治学有“遗传性”，即他所以能著作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乃是因为“龙生龙、胡生胡”。蔡元培的意思是，胡适老祖宗是绩溪“三胡”之一。“三胡”，说的是后唐明经进士胡昌翼的后人，分别是金紫胡、尚书胡、明经胡，不仅自己有名，子孙辈也出过不少宦官与名家，遗传基因好。

40年后，胡适说：“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，即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，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。蔡先生指出‘绩溪胡氏’是有家学渊源的，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，与我并非同宗。”

胡适纠正蔡元培的说法，曾被人

称赞为大家风范。只是，这个纠正来得太迟，过去40年了。40年前，难道胡适不知道这是“知识性错误”？有一种可能，胡适当时的名气还不大，有意假借绩溪“三胡”后人，40年后，他已成功成名就，学术地位或许比绩溪“三胡”更高，为了不遭人笑柄，便自查自纠。

这本书1919年初版，封面赫然印着“胡适博士著”。有人考证说，其时胡适并未取得博士学位，他于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博，因在《新青年》著文，暴得大名，1917年，便接到北大聘书，胡适便不再当大学“老童生”，“舟楫摇以轻颺”，回到北大当了“新教授”，根本不曾完成读博“规定住校年限”，其学位论文也仅仅完成“导论”。

胡适后来倒是拿了几个博士学位，也算是名副其实。

# 华罗庚难倒爱因斯坦

刘兴尧

华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，和计算机之父冯·诺依曼和爱因斯坦都是同事，也是朋友。华罗庚有一天和冯·诺依曼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咖啡馆喝咖啡，正好看到爱因斯坦在不远处的桌子旁一个人坐着。

华罗庚给冯·诺依曼出了道题，这道题是他的老师王维克先生当年考验华罗庚的，相当于现在的数学智力题。当年华罗庚就是因为很快解出了这道题，才让王维克认为他是难得的数学天才，下定决心对他倾心培养，从而改变了华罗庚的一生。

今天，华罗庚把这道题拿出来考验这位计算机之父，冯·诺依曼思考良久，感到很难，做不上来，就说：“你可以出给爱因斯坦博士，让他来做。”华罗庚觉得道理，就起身走到爱因斯坦对面坐下，说他有个题目弄不懂，想请博士给解答一下，爱因斯坦答应了。华罗庚就说：“假设有13个外表一模一样的球体，它们的重量分毫不差，除了

其中一个球稍有差异，给你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，如何在三次之内，把那枚重量不同的球体找出来？”

爱因斯坦苦思冥想，没有想出答案，他无奈地对华罗庚说：“华，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”华罗庚知道，爱因斯坦想把问题带回去考虑，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爱因斯坦回去又思考了好久也没得出答案，只好请华罗庚解惑，这时，冯·诺依曼也想知道答案，他俩就一起来找华罗庚。华罗庚告诉他们：要把13个球体按1至13编号，分成“4、4、5”三堆，先将1至4号和5至8号分别放到天平两端，如果重量一样，那么异常球在剩下9至13号中，如果重量不同，那么异常球在天平上的8个球中；再分别替换天平上两个未称重的球体，看是否平衡，作排除法，这样三次之内就能判断哪个是异常球了。

爱因斯坦和冯·诺依曼听后，恍然大悟，都惊叹不已。

# 朱东润从政80天

夏明亮

朱东润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。他从教长达70余年，其间却穿插了80天的短暂从政生涯。

1927年6月，正当而立之年，在南通师范学校任教的朱东润，接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邀约函，说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组建阶段，推荐他担任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。十几年前，朱东润跟吴稚晖办过《公论报》和《中华新报》，做过吴稚晖的助手，因而吴稚晖对他的才能和为人比较了解。

朱东润应召来到南京，不巧的是，恰遇吴稚晖出差到徐州去了，临时安排一个青年人陪朱东润。当天，那个青年请他到馆子里吃便饭。席上只有两人，说是便饭，却点了“四大四小”8个菜肴，“一桌不菲的席面”让过惯了清贫生活的朱东润十分惊讶。

在饭后随意聊天时，他们谈到在南京官员们经常看戏。对此，《朱东润自传》里写道：“最后说到他准备给一位女演员赋两首诗，问我能不能唱和一下。也许这个人有些大惊小怪，在革命中心，听到作诗去捧女演员，这

还不稀奇吗？稀奇的事还多呢，不久以后，有人指给我看在那座接待室里，蒋介石招待过电影女明星；又有人给我说狄秘书和秦淮河歌妓小金凤怎样要好。革命就是这样的革法，我这个中学教师真是开了一番眼界。”

朱东润原以为到南京是为国家效力的，哪里料到南京是这样一番浮华的景象：“这一年7月间，南京城里真是熙熙攘攘，过着太平的岁月……阴沟一样的秦淮河，在散文家朱自清的笔下是‘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’。一般的女士们，头发已剪短了，脂粉还是不能没有的。尤其在政府机关，有了这样的女同事，那时粉香四溢，格里啰唆的字句变得清雅真挚，东倒西歪的书法也变得笔飞墨舞了。”

朱东润很不适应这样的“太平的岁月”，周围那“一批没有脊骨的政治贩子”，更使他感到自己难以融入其中。因此，他刚刚领到不久的国民党党证，“扔在转角楼对面的屋脊上，由它风吹雨打，作为我这八十日生活的见证”。

朱东润在南京只待了80天，便回到学校，决意一心只做学问，终身从事教育事业。

# 林散之题款“耳”字由来

石佳峰

林散之自幼与艺术结缘，3岁便爱在案头涂鸦，5岁就能对物写生、塑泥人，天赋尽显。可命运弄人，中耳炎让他左耳微聋，这一遗憾伴随终生。

43岁那年春天，林散之去和县拜访好友谷沅如，未遇后被刁通庵邀至家中。小院里紫藤花开得正盛，二人在花下煮茶对饮，谈起日军人侵带来的灾难，满是忧国忧民之情。到了冬天，他再次来到和县住进谷沅如家，在灯下读沅如所藏的《河村集》，还作长句书于其后。那时，他书画署名已出现“散之”“林散之”“乌江林散之左耳”等，常用“散之”印章，“左耳”似乎开始融入他的署名习惯中。

43岁那年秋天，林散之游历狮子岭、惠济寺。也是这个秋天，他在芜湖柳春园一处查封书房内得到吕留良虫蛀砚，此砚后藏于“林散之书画陈列馆”。这期间，他书画署名越发多样，像

“散之”“林散之”“林散之左耳”“左耳”“散之左耳”都有，还自刻“左耳”印章，往后时常使用。

有一回，启功好奇地问林散之，为何题款常用“耳”字。林散之风趣作答，说自己左耳听不见，这毛病跟随自己多年，是抹不去的印记，便想着体现在题款里了。启功也幽默回应，称那天自己耳朵听不见了，也要叫“启耳”呢。

林散之把“耳”字融入题款，不仅是因身体这一特征，更是对生活的坦然接纳。那左耳微聋的经历，虽算遗憾，却也成了独特标识。他以豁达心态面对，让这段经历化作艺术署名中的别样元素，使之更具个人色彩与故事性。

从最初不经意地融入，到后来多样署名中频繁出现，“耳”字背后是他一生的起伏，是艺术与生活交织的印记，承载着他的过往、性情，也见证了他那份面对生活磨难时的风趣与豁达，在书画世界留下了这令人回味的小插曲。

# 张謇与梅兰芳的“极惜”之情

黄正平

“众人极赞浣华之时，即老夫极惜浣华之时。”1916年12月中旬，年已63岁的张謇又致信22岁的梅兰芳，首句明表自己“惜”梅之情。这一年，从10月初至年底，张謇接连写给梅兰芳7封信札，平均每10天便有一封。一个“惜”字，道出江苏同乡张謇与梅兰芳相交十多年的情谊。

《张謇全集》内有《函电》上下两卷，其中张謇致梅兰芳的尤其多。第一封信于1916年10月初发出：“晚华小友如晤：别一年许矣……”此前的1914年，任职北京政府农商部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，有了更多观看名家演出机会。当年农历冬月十九，就曾“至公府陪宴观剧”。总统府的演出，自然少不了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儿。次年6月18日“有观梅郎戏艺作此诗”，次日又“有重赠梅郎五绝句”。

有学者指出，目前收集到的张謇致信函电梅兰芳共有50多通，《张謇全集》就记载有30多通。这些信函由张謇主动发出为多，在建伶工学社、邀梅兰芳演出的1919年前后尤为频繁。

张謇与梅家的缘分，说来更早。1908年，张謇撰过《记沈雨辰说梅巧林》一文，梅巧林是梅兰芳祖父，也是京剧表演艺术家。青年时代就已爱好

戏剧的张謇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更多以观众身份看演出。然而，从观剧到通信，从切磋戏文到谈论琐事，从邀约主持伶工学社到3次在南通近距离接待，张謇与梅兰芳越走越近，已非一般意义上的“戏迷”，更应称为“知音”。张謇对梅兰芳的称呼，早期用得最多便是“小友”。

二人之间说艺论文的遗存也颇多。“《思凡》，音与节合，容与情称，绝无遗憾。”“《葬花》，通体婀娜绰约，隐秀无伦。”“订旧从改正脚本始，启新从养成艺员始。”“美术学中有戏剧，与专言通俗者不同。质言之，戏剧美术犹歌舞，舞今所无，歌可以昆曲、二簧赅之。”

1916年11月18日，张謇专信致梅兰芳，讲名字义必相因，建议“晚华”改为“浣华”，并称：“亦望小友始于春华之妍，而终于秋实之美也。”盼望梅兰芳能成为更好的模样。后来，张謇信中往往直接称呼梅“浣华”。

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，继而支持教育、慈善事业，他认为戏剧是最为通俗的教育：“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，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。”于是，他建更俗剧场、办伶工学社，让南通成为令人瞩目的京剧重镇。

“仆因复动通俗教育、改良戏剧之

夙愿，而不得不待商于子。若能于三月内来，则为仆助者益大。”信里，张謇言辞恳切邀梅兰芳到伶工学社任教。虽最终梅兰芳未能成行，改由欧阳予倩担任，但梅欧二人在更俗剧场开台合演，首开一代文明戏风，“试验演习场”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佳话。

为了邀请梅兰芳来演出，张謇派轮船专程接运，领着他参观自己所办企业，在新式剧场专辟“梅欧阁”，后又编辑成《梅欧阁诗录》，可见用心之极。张謇还题写匾额“梅欧阁”，并在一旁挂了一幅他自撰自书的对联：“南派北派会通处，宛陵庐陵今古人。”梅兰芳理解张謇用心，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中说：张謇设立梅欧阁，“这是他有意图用这种方法鼓励后辈，要我们为艺术而奋斗。”

张謇获取状元那年，正好梅兰芳出生，两人虽相差40岁有余，但可谓无话不谈。1920年2月21日，张謇告梅兰芳“今日亦为吾弟作书矣”，还附了诗律：“分明只影成双影，或者前因起后因。”意为虽是一个人在游林溪精舍，但他想象着有两个人，所以“只影成双影”，有同游“破蕾新”的梅枝胜景。

民国初年，张謇在黄马山和黄泥山西的嶺山营造“西林”和“梅垞”，种植大量梅花。他在信上说：“仆营梅垞颇不负